**3、中日两国“同文同种”**

按照日本典籍《古语拾遗》的记载，“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么，日本语言是如何形成的呢？

迄今为止，关于日语起源有多种观点，依然没有定论。概括而言，主要是日语究竟主要受到来自北方的语言的影响，还是受到来自南方的语言的影响？

190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教授藤冈胜二列出了14项阿尔泰语的特征，其中13项特征在日语中同样存在。

1914年，俄国学者波利瓦诺夫指出：“我可以证明，日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同根同源。”

形态学分类法根据语法结构特点，把人类语言分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复综语四大类。  
 屈折语以印欧语系各种语言为代表,如俄语、英语、法语等，以词形变化作为表示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主要特点是词形变化。例如，“他”在英语中主格是he,宾格是him。

黏着语以突厥语系为代表，日语也属于黏着语。在我看来黏着语最大的特点一是没有的成分很多（举例），还有就是动词在词尾。因此，认为日语主要受到北方语系的影响的说法，是靠谱的。

孤立语也叫词根语,以汉语为突出代表。孤立语的主要特点一是单个词含义明确，这也是为什么称为孤立语的原因。例如，“秋”天的秋，意思明确，但是秋天和秋天中的秋有什么区别？二是语序严格。例如，“你爱我”和“我爱你”，同样三个字，顺序不同，意思完全相反，三是汉语不是拼音语言，读写分开，因此同音字特别多。例如，“教授”和“叫兽”读音一样，意思……当然，也可以说一样。

复综语的突出特点是词和句子合二为一,没有一个能独立使用的词,只能连缀成句子使用。例如，汉语动词“吃”可以独立运用,但在美洲印第安语中,必须把吃的对象说出来,所以一个词带出一个句子。

日语并非来自中国，但日文是从中国传入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这本书中写道，“大约在1400年前，汉文就传入了日本。但直到推谷朝（6世纪），只有一小群专家使用汉文，他们对当地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以及隋唐文物制度的引进（6——9世纪），学汉语和懂汉文的人数才大大增加。”

很多论著提到，1784 某日，也就是在江户时代，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挖沟时偶然发现了一颗印面正方形的金印，边长2.3厘米，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而成为日本国宝。但是，日本的中国史专家怀疑这枚金印是赝品。然而，在1956年，云南一座滇王墓中出土的一枚金印“滇王之印”，仿佛左证了这枚金印的真实。因为，两者极为相似。此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扬州市的汉墓附近又出土了一颗“广陵王玺”。“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几乎同出一辙，稍有不同的是“汉委奴国王”是蛇纽，而“广陵王玺”是龟纽。那枚金印是真是假，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有两样东西证明，日本人至晚在5世纪已开始使用文字：一是中国478年的史籍中，有“倭五王”中的“武”，即雄略天皇呈“上表文”的记载；二是在九州岛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一把大刀，刀上有银的象眼铭文共74个字。

日文形成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一、以不确定的汉字为日语注音。二、一字一音，形成万叶假名；三、简化汉字楷书形成片假名；四、简化汉字草书，形成平假名。假名是相对真名，即汉字而言的。“假”的意思是“借用”，“名”的意思就是字。“假名”就是“借用的字”。

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理论。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日本和中国虽然可以说“同文同种”，但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和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有很大关联。不仅文字，作为日本国老大的“天皇”两个字，也是从中国“进口”的。欲知详情，请听我下节课讲述。

**4、天子 + 皇帝 = 天皇**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写道，“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和赤裸裸地攻击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仇恨和煽起他们的敌意了。”这句话表明了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今天，日本仍有“菊禁忌”。

本尼迪克特之所以将她研究日本的著作题名《菊与刀》，除了以“菊”和“刀”象征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还因为“菊”是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士身份的象征。这是两个了解日本的关键词。

日本的家徽产生于平安时代，即公元794年到1192年。当时，一些达官显贵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及家世，常从各种动物或花卉的图案中挑选自己喜爱的图案装饰在车、与、服装、家具上。由于某一家族反复使用同一图案，世代相传，因而这种图案便成了家族的标志。这就是家徽的起源。选择菊作为皇室的家徽，是后鸟羽天皇（1180-1239）。

到了江户时代，制作家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甚至不准佩刀、没有姓氏的农、工、商阶层，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徽。但是，皇室的家徽和其他家族的家徽，有着“圣俗之别”。因为，天皇是神，不是人。如前面所说，“神道的圣经”《古事记》着力宣扬的，就是天皇的神圣性。

中国的儒教对日本影响很深，按照著名的日本通、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的说法：“一亿日本人都是儒教徒”，但正如江户时代儒学代表人物藤田东湖所指出的，在儒教的学说中，有两条决不适用于日本，“一条是禅让，一条是驱逐、讨伐君主”。“万一有人倡导禅让学说，但凡大八洲（按：即日本）的臣民皆可鸣鼓而攻之。”

佛教僧侣和信徒也都认为，天皇是神圣的。镰仓末期佛学大师兼好法师在他的名著《徒然草》中写道，“天皇的伟大地位令人敬畏。所有皇族成员亦非凡人之辈。”

日本国旗“日之丸”和国歌“君之代”，都和天皇有关。日之丸的正式名称是“日章旗”。“章”意为“标记”。“日章旗”就是“作为太阳标记的旗帜”。日本神道最重要的神、被视为皇室祖先的天照大神，就是太阳的神格化。

日之丸自公元8世纪开始使用，原先称“天皇旗”。12世纪初，武家政权的创建者源赖朝和平清盛互争雄长的“源平争乱”期间，武士常常在军扇上画一个太阳图案以示“正统”。15至16世纪，太阳旗被广泛用作军徽。在迄今留存的描绘战争场面的屏风画，有清晰显示。1575年织田信长、德川家康联军对武田胜赖的长筱之战，战国武将都悬挂日之丸，以示“吾乃国家真正的霸主”。1600年“决定天下之战”的“关原之战”屏风画，也有日之丸。日本历史上群雄纷争，战乱不止，但没有哪个枭雄试图推翻天皇取而代之。因为，天皇是神，神是不能被人取代的。

日本现存最早的日之丸收藏于山梨县盐山市的云峰寺，由平安时代后期后冷泉天皇（1025年—1068年）赐予武将源义光。日之丸在国际场合的正式使用，是19世纪50年代。今天的鹿儿岛县、即当时的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在1853年底，建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三桅蒸汽船“升平丸”。第二年，岛津齐彬将这艘船呈献给幕府。“升平丸”随之改名“昌平丸”，“丸”在日语中可以表示“船”。日之丸最初被用作日本商船标志。日之丸真正成为法定意义的国旗，是1999年日本国旗国歌法实施以后。

日本国歌“君之代”歌词改编自公元10世纪的《古今和歌集》，歌词大意是：“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对天皇的歌颂，显而易见。

当今日本明仁天皇已是第125代天皇。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初代天皇是“神武天皇”。但是现经考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大都是传说，不可作为信史。例如，从第二代绥靖天皇至第九代开化天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只提其名，未记其事，被日本史学界称为“欠史八代”。

那么，作为君主号的“天皇”最早出现于何时？早在公元1118年，就有人提出是在推古朝，即7世纪初。按照那种说法，圣德太子取“天子”和“皇帝”前缀，创制了“天皇”号。606年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国书，起首就是“东天皇敬禀西皇帝”。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和角林文雄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当时“日本”君主自称“天王”，而别国则称他“倭王”。上述国书中的“天皇”很可能是“天王”。由于原文佚失，只能存疑。

迄今为止，关于“天皇”号何时出现，日本学术界主要有 “推古朝说”、“持统朝说”、“天智朝说”三种观点，尚无定论。

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提出，最迟到汉代，中国君主名号的“功能”已出现分化：在祭祀天神地只时是“天子”，在号令王侯臣民时是“皇帝”。但是在日本，“天子”和“皇帝”自古就是“合二为一”的“天皇”。至少，从政教合一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那么，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倭”，又是如何变成“日本”的呢？请听我下节课进行解说。

**5、“倭国”变身“日本”**

公元前6世纪左右，刘歆整理并呈献汉哀帝的《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已有关于倭的记载：“盖国在鉅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最初的文字记载。王充的《论衡》也有关于倭的记载：“越裳献上白雉，倭人献上畅草。”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刘彻在朝鲜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藩四郡。班固（32－92年）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百余国中最主要的国家“邪马台”，也可写作“大和”，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在经历了公元2世纪末发生的一场大乱后，“倭”形成了以卑弥呼为首的政治联合体，即大和政权。最后，邪马台国统一了“百余国”，成为中央政权。但是，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在日本经历了数世纪的争议。

争论的中心，是邪马台国究竟在畿内，即奈良县中部的“大和盆地”，还是在北九州地区？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日本曾被称为“京大”和“东大”之争。因为，以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大和说”，以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九州岛说”。

1971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开始着手发掘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隅三轮山西南方一个高坡上的缠向遗址。缠向遗址规模庞大，有约1平方公里。经过数以10年计的发掘，终于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记纪》所述的第10代天皇崇神天皇的瑞垣宫、第11代天皇垂仁天皇的珠城宫、第12代天皇景行天皇的日代宫遗址，均在其周围。诸多现象显示，缠向遗址是“大和政权”的发祥地，是天皇的“摇篮”。2011年8月，我曾在当地亲眼目睹了很多可以证明当地曾是大和政权发祥地的出土文物。

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以后，与权力等级制的形成，在近畿等地区出现了一种前方后圆的坟墓，之后这种坟墓逐渐扩展到自九州岛北部到东北南部的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域。所以，这个时代在日本历史上又被称为大和·古坟时代，大致延续到6至7世纪。

大和·古坟时代大致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以镜子、碧玉制腕饰等咒术、宗教色彩较强的随葬品，以及狭长的坚穴式石室和黏土廓等为特征，跨越年代为4世纪前后，属古坟文化的形成期。中期的特征是前方后圆坟的规模达到顶端，铁器、石制仿造品以及新增添的源自大陆的马具被当作随葬品，炫耀权力的祭祀的礼仪化得以推进，跨越年代大致为整个5世纪。后期以横穴式石室、马具的普及、群集坟的发展等为特征，表现出对大陆文化的全面吸收和咒术、宗教要素的淡化，时间跨度为6至7世纪。

5世纪－6世纪，大和朝廷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建立起了全国政权――大和政权。大和政权的政治结构呈金字塔形。同时，整个国家形成由各生产集团组成的、世袭的部民制。

那么，倭是如何变成日本的？关于为何取名“日本”，在日本平安时代发生的一场争论中曾有解释。据《日本书纪私记》记载，承平六年（公元936年），在一个关于《日本书纪》的讲座上，参议纪淑光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将‘倭’改称‘日本’？”。对这一提问，讲师引用《隋书·东夷传》中“日出之国”一词，答称：“日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纪淑光再问：“‘倭’确实在大唐东面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但是在日本本土，太阳岂不是在国家的中间升起？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称‘日出之国’？”对此，讲师的解释是：“因为从唐（中国）的方位看，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另据《释日本纪》记载，在904年的一个讲座上，有人问讲师：“现在称为日本的我们国家的名号，是唐朝给起的，还是我国自己定的？讲师明确回答：“是唐朝起的。” 长期以来，由于认为“日本”之国名“是唐朝起的。”因此早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就出现了一些对“日本”这一国名“非常厌恶”的国家神道家。例如，佐藤忠满就曾提出，“原封不动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国号并用于和唐朝交往，实令人非常厌恶。”这一立场也为以后的国粹主义者所承袭。1996年，日本放送协会（NHK）“人类大学”栏目，在以“日本史再考”为题播送的节目中，有人认为，曾有一部分统治者决定的国号，可以用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进行改变。

但是，中国史籍却否定“日本”由中国命名的说法。例如，《隋书》记载：“日本国，倭国之别种，以其国在右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新唐书》记载，“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宋史》则开篇即直呼“日本”：“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宋代以后，中国王朝正史不再有《倭人传》、《倭国传》出现，而以《日本传》取而代之，说明中国官方尊重“日本”的自我选择。